革命史觀與戰後日本中國研究之社會主義系譜*

邵 軒 磊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 要

「革命史觀」是日本戰後中國研究的核心觀念之一，尤其在 1949 年到 1972 年期間更是學界最主流的「視角／方法」。本文從戰前的社會主義演變出發，以革命史觀為中心做出整體性回顧，藉由對其中論爭、研究成果、方法論的整理，描繪出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思想系譜。藉此對日本思想史有完整認識，由此也更能瞭解現今日本看待中國的觀點和立場。革命史觀的方法論與觀念始於馬克思主義，日本左翼研究者由於戰時受到壓迫而前往中國，因此擁有中國經驗與珍貴田野資料。之後的發展可分為方法論與中國視角的雙重問題，而出現不同演變脈絡。1972 年開始革命史觀退潮，自此「中國有其自身的國家利益」觀點開始興起。本文試圖對革命史觀與戰後日本中國研究社會主義系譜之完整脈絡加以理解，並且賦予此一史觀歷史與社會上的意義。

關鍵詞：方法論、社會主義、革命史觀、現代中國研究系譜、戰後日本

* * *

壹、研究背景

「革命史觀」作爲日本中國研究中的重要意識之一，從 1949 年直到 1970 年代長達 20 餘年中作爲核心方法論而存在。意味著將中國社會各階段符合社會主義的發展路徑：到清朝爲止是封建社會，中華民國是半封建社會①，而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階段論爲中心，將中國發展進程等同於

*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指教，以及數位老師的細心指正，使本文得以避免許多錯誤，特此誌謝。

註① 國分良成，「建國 50 年－中国研究と中国近現代史の再検討」，**北大法学論集**（札幌），51 卷 4 号（2000 年 11 月），頁 1396~7。

「蘇聯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史觀。②這種觀點從 1970 年代開始轉變，到 1980 年代中期幾乎完全消失在研究視角中③，自此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研究的立場上失去舞臺；而日本學界總體對中國觀感也隨之改變，繼 1980 年代初展開了一波「再評價」風潮，種種「亞洲／中國」思維也繼之而起，這些思維或有戰前東洋學或美式區域研究的影子，都是在「革命史觀」的思潮退去後才浮現的。

革命史觀擁有雙重的特殊性，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而言，彼此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首先對日本而言，日本幾乎沒有對其他國家有如此複雜的情感，包括戰爭前對中國的蔑視④，戰爭後對中國的愧疚感以及在社會主義思潮影響下對中國的嚮往，其上更交織著傳統以來的中華觀念，以此爲背景，日本描述中國時具有特殊情感⑤。另一方面對中國而言，幾乎沒有其他國家對中國歷史研究如此瞭解⑥，而又採用了各種多樣的視角對中國加以研究，甚至「中國研究」足以成爲那個文化集體思想的重要組成，以及社會運動的基礎。在這樣雙重的特殊性之下，若要增進中日兩國間相互瞭解，對革命史觀的研究實屬不可或缺，以此爲媒介，更能瞭解研究得以建立的歷程。

本文從戰前的社會主義系譜⑦出發，並針對「中國研究」的發展來描述，以 1949-1972 年這段革命史觀主要開展的時間爲中心做出整體性回顧，藉由對其中論爭、研究成果、方法論的整理，描繪出此間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思想系譜。日本主要的革命史觀研究者，大多來自於一般所認爲的「帝國主義研究機構」，諸如滿洲鐵道部以及東亞研究所中的研究者。這些社會主義者在戰後成爲第一代研究中國的主力：從 1940 年代末的學術重建、1950-1960 年代的「近代化論爭」、1960 年代的安保事件、文革影響、

註② 久保亨、江田憲治，「現代」，鹿波護等編，**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 年），頁 264。

註③ 久保亨、江田憲治，前引文，頁 264。

註④ 最有代表性的正是伴隨日本近代化以降的脫亞論，脫亞意味著：「若擺脫中國，則東方所象徵的停滯、封建、落後等等便由中國背負，日本加入近代性、普遍性與進步性的願望便得以實現。」石之瑜，「退出中國—近代日本對華思想中的普遍性方法與政治正確性問題」，**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1。

註⑤ 松本善海將這種情感以「苦悶」來形容，認爲：「中國學」研究者的心中「對於過去中國的尊敬與對於現代中國的辱麗同居著」，所以現在對於中國的是不是會變化，這兩個視角正不斷掙扎著。……這就是所謂「中國研究者的苦悶」，是當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松本善海，「中国の苦悶と中国研究者の苦悶」，**世界**（東京），44 期（1949 年 8 月），頁 31~38。

註⑥ 在史料上別的國家也不能提供如此長久的研究基礎。

註⑦ 「思想系譜」指的是在這些思想中「連續／不連續」的思想脈絡及其理由。而日本社會主義作爲思想體系，主要是指以唯物與科學的思想體系爲核心，起碼包含了對社會、經濟、政治等等的種種看法與研究，數量極爲龐大。因此，在本文中所指稱之「社會主義系譜」，並不討論政治層次的「社會主義政黨/政見」，而是作爲知識論與方法論中具由「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主要研究理論的思想及其人物。而進一步討論其中的中國研究部分，與傳統中國研究者的主要不同之處是在於試圖超越單一議題而使用「體系化理論」做出研究，更注重於「生產力/生產關係」以及「世界史的議題」。其中或有對中國大陸支持或反對者，主要的成員身分在戰前有日共成員、滿鐵與東研的部分研究員、左翼大陸浪人等；在戰後主要散見於學界（以中國研究所爲代表）當中。題目所指稱的「戰後」指的是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後起算至今。雖然本文略有溯及戰前社會主義發展，但僅將其作爲背景而整理，並不擬深入討論，主軸依然是 1945 年之後的發展。

以至 1970 年代的冷戰體系騷動，都扮演了社會主義理論開創的重要角色，甚至也實際參與了運動。此一世代從滿州事變到 15 年戰爭期間開始，進行執筆活動、社會活動，從戰爭責任到文革論爭爲止，對中國的研究、評論、甚至是日中友好等等運動，都擔任重要的指導角色。⑧由本文的系譜可以看出，革命史觀是跟隨著此一世代的生命歷程而變遷的。

近期亞洲國家互賴程度更加緊密發展，跨文化多元的對話逐漸增多，中日之間也正進行著「歷史再建構」的工作，但彼此的歷史理解還帶有差距。現今中國大陸方面研究者，對於日本左翼的思想認識不算充分，不免帶有刻板印象，甚至受到過多民族主義的影響。在台灣的中國研究界注意到了這種情形，除了傳統的「漢學／中國學」研究著作之外，近期更開展了作爲方法與知識論的「日本中國研究」範疇，以**中國大陸研究** 2007 年 3 月號「近代日本對華思想」專輯爲代表，對日本中國研究界甚至整體思想界加以注目⑨。本文立基於此，試圖對於日本中國研究界之社會主義系譜加以整理，提供對日本思想史更多的認識。革命史觀在這個意義上所代表的是日本思想界社會主義系譜的核心觀念，對學界的中國觀影響十分重大，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在日本中國研究上的具體展現，更可以說是人類學術研究的重要思想遺產。

貳、先行研究與研究架構

革命史觀佔有近 30 年「日本中國研究」主流研究思想的重要地位，本節藉由考察先行研究中的「分期」來宏觀地描述現存對於革命史觀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兩期說」。伊藤以 1970 爲界分爲前後期，前期爲政治與意識形態傾向，但是 1970 年代末隨著中國自身否定了文革，研究者對於中國與中國革命的看法轉變。所以 1970 年之後，中國研究的「政治」傾向消失，也就是說把中國當成「普通」的國家，回到了區域研究的基礎上。⑩而国分良成也將 80 年代之後描述爲「革命史觀被改革開放史觀、鄧小平史觀所取代」的一段時期。⑪同時久保與江田採用 1980 年爲分歧

註⑧ 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アジア現代史**（東京：歴史学研究会，1985 年 11 月），頁 10。

註⑨ 本專號中有討論思想的石之瑜，「退出中國—近代日本對華思想中的普遍性方法與政治正確性問題」，**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1~8。石之瑜、李靜旻，「斷代與斷裂—日本近代中國認識的基礎脈絡」，**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9~27。孫歌，「在大陸語境中翻譯竹內好——進出政治正確的中國論述」，**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69~84。與討論實際制度性質的李朝津，「日本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慶應義塾大學政治學科之個案研究」，**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29~45。周兆良，「日本高等教育對中國的教學識程初探」，**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99~114。以及思潮對於社會和個人影響實踐意義的林泉忠，「祖國的弔詭—現代衝擊下沖繩身份的脫中入日現象」，**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47~67 和李曉東，「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85~97。以上的論文，將重心置於「學科研究」的過程，是迄今新穎的發想。

註⑩ 伊藤一彦，「日本的中国研究」，**現代中国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1990 年），頁 3~4。

註⑪ 国分良成，前引文，頁 1397~8。

點，之前主要爲意識形態的方法論，主要的特色是社會主義路徑（革命中心史觀，對革命有感情）與實證主義路徑（近代化研究，量化與政治支配特質）的爭辯。⑫容或各篇主張的分界年代有所不同，但有相當高度的一致性，這些研究多藉由「革命史觀」作爲核心關鍵詞來分界⑬，可見革命觀點足以在當時成爲重要研究意識。

而中文文獻表現出來的是「三期說」，如嚴紹璗分爲：一、日本戰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1945-1966，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國觀），二、文化大革命（1966-1976，文革的中國觀），三、現今期（1976-2005，變異的中國觀）三期⑭。文中的立場以日本對於中國「支持／反對」態度爲參照點，將日本思想史中的主流意識加以呈現。喬志航以 1978 與 1990 兩個轉折點，以「政治與學術的關係」分爲三期⑮，第一期日本受冷戰與美國影響，研究立場上反對中國；第二期使用實證研究，中國學迅速發展；第三期則走向更加開放，⑯喬以研究性質的轉變作爲主軸。從中文研究文獻的分期年代可以看出，在中國學者的認識裡面，日本的中國研究與政治有相當高度的共變關係，不管是研究態度的轉向或性質改變，都是伴隨著中國所發生的重大事件⑰，而非出自日本學界的發展節奏或是日本社會的總體氣氛，這樣一來反而與日本研究者自身的理解有所差異。茲將以上所介紹的分期表列如表 1。

表 1　先行研究分期一覽

作者／寫作年代	分期數／分期年代	分期意義	依據／解釋
伊藤一彦/1990	2/1970s'	意識形態→客觀研究	研究條件的轉變（史料增加、交流往來等）
嚴紹璗/2005	3/1966, 1976	反省→革命→變異的中國觀	各種族群對中國的觀點
喬志航/2000	3/1978, 1990	對中國反對→實證→開放	政治與學術的關係
久保亨、江田憲治/2006	2/1980	社會主義/量化研究→多元研究	學術條件發生轉變
国分良成/2000	2/1980	革命史觀→改革開放史觀	中國自身轉變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註⑫　久保亨、江田憲治，前引文，頁 264。

註⑬　有個例外是山根的作品，以 1958 年爲界，前期爲「試圖使用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經驗，嘗試以蘇聯的研究模式套用到現代中國的研究。」山根幸夫，「現代：戰後の日中交流とわが国中国現代史研究の背景」，山根幸夫編，**中国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 年），頁 499。而後期的特徵是「建立在日中友好運動到日中國交回復這個基礎之上，有交流可能的研究。」山根幸夫，前引文，頁 503。山根是少數的主張，但考慮到當時寫作的時間點是 1983 年，當時學界正處於轉變的時期，取代革命史觀的理論尚在發展，因此這樣的說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這個基礎之上，社會主義者又添加了幾種分類：如野沢豊將戰後中國研究界的演變，分爲 4 期：敗戰之後（45－50 末）、AF 鬥爭前後（60 初）、文革期（60 末－70 後半）、四人幫事件後（70 後半－）。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頁 11。是將 AF 事件與文革期獨立出來討論。

註⑭　嚴紹璗，「戰後 60 年日本人的中國觀」，**日本研究**（北京），2005 年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1~6。

註⑮　喬志航，「當代中國學研究格局」，**廣東社會科學**（廣東），2000 年 1 期（2000 年 1 月），頁 138。

註⑯　喬志航，前引文，頁 138~9。

註⑰　甚至「三期」的理解也是現代中國常用的三分理解法。

總體而言，這些著作都公認是日本在 60 年代末之前能夠劃分出一期，並以意識形態爲核心來研究，而日本學者更進一步指出當時的意識形態正是革命史觀。然而對革命史觀（意識形態）的評價就多有不同，中國學者認爲日本受到政治（保守政黨聯合、美國冷戰結構等）影響而與中國處於不同陣營，從而學術上無法支持中國。反之，日本學者多半歸因於現實狀況（無法往來、資料有困難等），同時也都會注意到「其他史觀」的部分。但雙方的研究中都迴避討論諸如「革命史觀本質」的問題，中國學者完全漠視其存在，而日本學者也僅止於描述性或定義上的認識，而不討論「革命史觀」作爲當時主流思想的原因，甚至是其代表的社會意義。

本文藉由革命史觀社會主義系譜爲核心，以「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爲兩條主要脈絡，鋪陳出日本戰後對於「革命中國」的思想史。試圖指出革命史觀不僅只是「支持／反對中國」的心情，或是以「社會／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方法，而是包括兩者的有機組成：在價值觀上將「現代中國」視爲與前代完全阻絕，所做的行爲都是「斷裂／革新」，從而現代中國的一切行爲都是與前代無關而且正確的一種視角。這種視角不僅構成了整體中國研究的共同心理，也是初期日本研究者的盲點⑱所在。在此之上，更進一步說明在既有文獻中革命史觀「急速轉變⑲」的印象，本文想指出革命史觀的方法論與價值觀長期以來都不斷遭受其他思潮或是研究方法的挑戰，每次都引起學界的反省與修正，同時也成爲轉向的基礎。這些基礎並非一次性斷裂，而是在歷次的論爭與事件中逐漸成形。並且作爲「視角／方法」的二元結構，兩者崩壞的歷程、時間點與方式都各不相同。

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社會主義研究

作爲研究方法的馬克思主義途徑最早成爲日本學術議題是伴隨著日本對亞洲（尤其是中國）的擴張而生成的⑳，藉由「日本資本主義」論爭㉑爲發端，當時社會主義被定位爲「反體制運動」，主要分爲兩個階段：由 1927 年的「27 宣言」（27 テーゼ）到 1932 年是一個階段，之後到 1937 年日中戰爭對言論的壓制後告一段落。㉒

第一階段中以馬克思主義研究重鎮「產業勞動研究所」在 20 年代末發行**社会問題講座**㉓與**マルクス主義講座**㉔兩部著作作爲發端，開始了「科學的」㉕亞細亞研究。但當

註⑱　正因缺乏革命史觀之外的視角，幾次中國政治重大事件，諸如中蘇論戰、劉鄧失勢、文化大革命、中蘇戰爭、中美友好，都容易造成日本研究者「跌破眼鏡」的原因。

註⑲　日本學者多持此一看法，如久保亨、江田憲治，前引文，頁 264。

註⑳　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頁 23。

註㉑　主要討論日本到達了資本主義的獨佔階段之後，面臨世界經濟恐慌，對內產生法西斯主義、對外想要亞細亞支配的社會現狀把握研究，同時對外也必須處理對亞洲的認識視角。

註㉒　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頁 23。

註㉓　大宅壯一編，**社会問題講座**（東京：新潮社，1926-7）。

註㉔　政治批判社編，**マルクス主義講座**（東京：マルクス主義講座刊行会，1927-1928）。之後 1929 年以野呂榮太郎（馬克思主義講座主要作者）爲中心，開辦了「ボロレタリア科學研究所」（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其中設有支那問題研究会，發行ボロレタリア科學（無產階級科學），開始討論中國問題。

時的主要議題是社會主義語彙說明亞洲國家的歷史與現狀㉕，以此對照日本自身的發展路線做出研究㉖。「中國研究」一詞最早則是以 1932-3 年**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講座**㉗的出版爲代表㉘。矢野仁一在**滿洲国歷史**㉙中主張滿州並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提出合理化侵略滿州的「滿蒙生命線」論。對此大上末広首先提出反對「滿州獨立經濟」的論點。對此岩村三千夫站在反對滿蒙侵略的立場以列寧史達林的民族理論批判矢野，滿鐵內部的中西功也就「滿州經濟」的認識對大上加以批判，中西爲了對殖民地經濟現狀加以說明，創造出「半封建半殖民」等範疇㉚，是首次以馬克思主義觀念就「生產關係／社會結構」將中國社會加以階段性分類，被認爲是日本社會主義在研究中國時指標性的著作。

同時「日滿支經濟圈」的主張漸漸成形，國共內戰也正處高峰期，對於日本的社會主義中國研究又帶來轉變。當時將中共的「長征」視爲繼 1912 年辛亥革命，1927 年國民革命（北伐）之後的第三度「中國後進性」代表事件。對此平野著力於「中國

註㉕　當時的「科學」指的是超越時空的普遍性，而相對於傳統漢學對文化與經學針對一時一言的研究，馬克思主義帶有未來性與指導性質。以山根的話來說：「作爲科學的歷史學必須有兩個原則：其一從歷史事實複雜的現象中，找到歷史的法則性；其次，作爲社會科學原則的歷史、理論、政策三部分之一來認識。」山根幸夫，前引文，頁 496。

註㉖　以 30 年代「古代社會論爭」的發展爲例，首先要處理的是關於「是否存在亞洲停滯論？」並找到世界史的必然發展原則。阪口勉，「日本古代社会論」，歷史学/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史 9**（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50。「亞洲停滯論」指的是，由於中國具有無法進步的「社會因素」，所以缺乏以自身力量來近代化的動力，在戰爭期間中甚至成爲侵略中國的藉口。在此時日本部分社會主義者的觀念中，甚至以馬克思的東方專制主義與亞細亞社會論來證成「日本比中國優越」的觀點。

註㉗　所以阪口認爲重心放在：「原始到奴隸的過程，是否必然？」以及「日本做爲世界的一部份，是否擁有普遍性中的特殊形態。」阪口勉，前引文，頁 50。主要論者有渡部義通的日本古代社會，其中對於「大化革新後就終止日本奴隸社會」的分期加以反對，認爲這是日本/亞洲的特殊性質。但該書中，日本是與英國、羅馬作比較，而得到「東洋社會中奴隸主的形成與必然性與西洋相異」的結論，但是關鍵是「日本與中國的同一性」該怎麼處理，在日本當時的主流看法是「日本=普遍：中國=特殊（停滯）」。阪口勉，前引文，頁 51。這種主張在戰後遭到排除，在 1950-60 年代中國飛躍的發展使得這種論點幾乎不被認同，但是阪口認爲，「停滯論在 60 年代轉變爲近代化論」，直到 70 年代還不斷的鬥爭。阪口勉，前引文，頁 54。

註㉘　羽仁五郎等著，**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講座**（系列）（東京：岩波書店，1932）。

註㉙　此時也是「日本資本主義」論爭的發端。

註㉚　矢野仁一，**滿洲国歷史**（東京：目黑書店，1932）。

註㉛　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頁 24-5。在「中西/大上」論爭中，中西強調「半封建」是封建正在崩潰並轉化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期，但大上認爲指的是「封建/殖民」兩種社會形式互相加強的一種特殊社會樣態。請參考：小谷汪之，「（半）植民地・半封建社会構成の概念規定：中西功・大上末広の所説の検討」，**歷史学研究**，466 期（1977 年 7 月），頁 68~76。在中國，雖然此觀念早在 1926 年莫斯科中山大學國際評論社編譯出版國際評論創刊號上的發刊詞出現，但真正加以闡述則是表現在 1930 年代李立三的「新思潮派」論爭以及 1936 年何干之的「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作爲代表著作，最後由毛在 1939 年 12 月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定音。李紅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來龍去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国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3 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1~23。

農業問題」研究㉜，「官民支配」的分析，並且翻譯了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Karl Wittfogel，中譯魏特夫㉝）的**解體過程にある支那の経済と社会**㉞一書，對當時中國研究方法論提供了新方向，但也對亞洲停滯論提供理論基礎。之後由於政治因素，日本社會展開「馬克思主義撲滅」事件，控制社會主義研究者言論，甚至逮捕下獄。㉟因此社會主義研究者轉而前往中國本土做研究，也就是滿州鐵道部與東亞研究所，當時中國（尤其是滿州與華北）被稱爲「左翼的花園」，左派直到戰後才得以回到日本本土，實踐他們的學術主張。

戰後美軍佔領軍初期提出建立工會、開放普通選舉等政策，欲將日本建立成「民主自由非軍事」的國家，這點讓社會主義者充滿希望。於是在戰後日本社會主義政黨隨即提出了 1945-6 年的「民主變革論爭」，當時以「日本是否需要革命？」爲主要題目，產生了勞農派與講座派兩種體系，勞農派以「世界民主統一戰線」爲訴求，主張日本國家權力依然是由布爾喬亞所掌握，所以應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㊱其特色是對於封建制／天皇制㊲強力批判，並在 1947 年 12 月決定正式實行革命。㊳這種觀點以勞農派領袖山川均爲代表，但是並未被後來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人所接受。受到美國國際政策的轉變，尤其是隨著 GHQ 的反共態勢明朗化與戰犯釋放等舉動，使得革命思潮受到挫折㊴，從而轉變爲僅在學術界發展。但是另一方面，講座派的理論對當時的人而言較爲「正確」㊵（易於接受），而且有如野呂榮太郎的殉教者，還有「入獄 18 年」等光榮歷史。於是講座派理論被「神聖化」，並獲得多位非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贊同。㊶

除了共產黨之外，對此影響更大的是戰時研究人員的歷史經驗。1945 年 10 月，做爲當時中國研究中心的「中國研究所」準備創立。1946 年 1 月舉辦東京大塚「東洋文化研究所創立總會」，包括平野義太郎、石濱知行、伊藤武雄、堀江邑一、具島兼三郎、岩村三千夫、中西功、尾崎莊太郎、野原四郎、幼方直吉等等重要左翼中國研究

註㉜　以 1934 年平野義太郎的「支那研究に對する二つの道」一文對於中國的農工業理論的陳述爲例，引起學界極大的迴響。引自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頁 25。

註㉝　本書尚未有中文翻譯，同時 Karl Wittfogel 在中文世界中也尚未有固定翻譯名稱，較常見的有魏復古、維特高蓋、魏特夫等等。本文權以此人代表性的中文譯著中的譯名爲指稱，請參考：卡爾・A・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譯，**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1989）。

註㉞　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解體過程にある支那の経済と社会**（東京：中央公論，1934）。

註㉟　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頁 25。

註㊱　犬丸義一，「戦後日本マルクス主義史学に関する覚書」，歴史学／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108。

註㊲　社會主義者認爲從憲法制訂以來，「天皇」從絕對主義法西斯的統治者轉變爲資產階級君主制，也就是 46 年秋天開始，革命任務從反封建轉變爲反帝反獨占的民主主義。犬丸義一，前引文，頁 110。

註㊳　犬丸義一，前引文，頁 109。

註㊴　姬田認爲這樣一來造成了「日本人不完全民主主義的戰爭觀與世界觀」。姬田光義，「中國革命與中國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大阪），第 7 期（2000 年 9 月），頁 21。

註㊵　犬丸對講座派也語帶保留：「講座派雖然對於戰前日本有清楚的理解，但是面臨戰後急遽的變革，從現在的眼光來看也是失敗的。」犬丸義一，前引文，頁 109。

註㊶　犬丸義一，前引文，頁 108。

中心人物組成籌備會，於 1946 年 10 月中國研究所正式運作。[42]如前所述，當時的主要成員幾乎都隸屬於滿鐵調查部[43]與東亞研究所[44]等戰時研究機關[45]。這些人的中國情懷與實際中國經驗，使前期中國研究具有原始資料上的優勢。原本在中國從事研究的學者（多數有社會主義傾向，但並不全是共產黨）加入[46]之後，也使得社會主義在學術界成爲主流研究模式。而在政治上由於美國對日本政界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因此學界[47]成爲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主要的舞臺，也加深了學／政界在中國議題上對立的氣氛。[48]

此時史學界的主要思維表現在 1948 在歷史學研究大會的論題「世界史的基本法則」上。簡單的說，以討論「英法爲主的西歐發展路徑，是否能在亞洲表現出來？」[49]而提出「原始共同體到共產主義的交替路程」作爲一國史的發展階段，意味亞洲也能沿著西歐發展路徑「進步」。革命研究者（平野義太郎、岩村三千夫、山西英一等）對於此一議題的回答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對日本史／中國史／世界史」加以重新認識，從而找到日本未來的發展方向。[50]當時最重要的理解關鍵是對「亞細亞停滯論」的反彈[51]，要將「真實」的近現代中國以革命爲中心加以描述，同時對之前的明清中國全都否定，正是「斷絕性」革命史觀的體現。

綜上所述，戰前日本的社會主義學者雖然已經開展中國研究，但是是把中國當作日本總體政治經濟發展的「對象」，後因中國發展之經驗與考察資料，戰後遂將這些資料大量產出成爲中國研究的主流。日本研究者選擇革命史觀，其中不僅是對於研究方

註[42]　山根幸夫，前引文，頁 498。

註[43]　最早是東京帝大學者白鳥庫吉在日俄戰爭時遊學了歐美各國，受到各國的「亞細亞研究」的刺激。回國後也主張要經營日本的亞細亞研究。同時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的初代總裁後藤新平也主張「爲了滿州經營的目的，要有文裝的武備」，主張「學俗近接」，造成了白鳥與後藤合作的契機。1907 年設置了滿鐵調查部。伊藤一彥，前引文，頁 5。

註[44]　東亞研究所則是由企畫院調查官中佐池田純久提案，於 1938 年 9 月設立，隸屬於企畫院的財團法人，總裁是當時的近衛文麿首相。對於日中戰爭進行所必要的中國各地區與人文自然的調查協力，純粹的國策機關，在敗戰後解散。其中主要的研究者有：田佃茂二郎、山上次男、酒井忠夫、山本秀夫、小原正治等。伊藤一彥，前引文，頁 8。

註[45]　山根幸夫，前引文，頁 498。

註[46]　原因在於戰爭時受到國內言論限制的中國研究者（親社會主義傾向），前往滿州華北發展，但在敗戰後回國就職卻產生困難，大多只能尋找圖書館或出版工作，而無法回到大學。對應於此，中國研究所及受知大學等的設立，也有收容當時研究者的味道。野沢豊，「回顧と展望」，**現代中国研究**（大阪），第 3 期（1998 年 9 月），頁 111。

註[47]　除此之外這些戰時研究人員也多對於戰後日中民間往來有所貢獻，伊藤武雄在戰時擔任滿鐵調查部上海事務所長兼東研上海所長，在戰後中日友好運動中有卓越貢獻，而擔任中國研究所、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岡崎嘉平太戰時擔任華興銀行理事長兼東研上海支所調查顧問，戰後爲日中覺書貿易所代表。以及小澤正元、淺川謙次等都是在東研時期有關係的人員。伊藤一彥，前引文，頁 8。

註[48]　作爲背景，戰後日本政界在被納入美國世界戰略的一環而受控制的背景之下，整體政界朝向防範左派報復而右傾，與知識界的調整方向相反。

註[49]　遠山茂樹，「世界史把握の觀點」，**歷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之水書房，1996 年），頁 3。

註[50]　上原淳道、山根幸夫，「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東京），59 卷 5 号（1950 年 9 月），頁 44~45。

註[51]　遠山茂樹，前引文，頁 3。

法或意識形態的喜好，更多是潛藏在其中作爲個人的生命經驗意義[52]。雖然戰敗之後政治方面受到美國控制，但在學界中，左翼漸漸取得了較大的發言權[53]。此時的學界充滿以「馬克思歷史階段論」解釋每個文化的歷史位置，從而找到日本未來的發展方向的熱潮。其中蘊含激進社會主義者對於革命的期待，藉由革命來讓日本社會完全反省的希望，從而關注革命條件、革命進程等等問題。

肆、革命史觀的正式登場

伴隨著「新中國成立」這個議題，戰後革命史觀正式登場，尤其對日本左翼學者而言是視其爲社會主義實現，亞洲在馬克思的路徑上有可能「超越」大部分歐洲的意味，而加以無條件的支持與讚美。[54]「革命」意味著斷絕，也就是中國從此告別封建與落後。革命史觀最早的體現是在 1949 年 8 月「怎麼看中國的現狀—支那學者的回答」座談會[55]，以仁井田爲代表，他指出：「由於真正體現了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權力移動，中共革命相對中國以往革命（易姓革命等），是第一個堪當真正革命的革命。」[56]同時也對 1949 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給予成功的評價，認爲是「中國近代革命與意識的變革」。而且「近代中國革命，不但要克服古代與中世，同時也要超越近代，中國革命超越了三重的歷史課題與多難的道程，提供了後進國革命的方向。」[57]貝塚也認爲，先要瞭解「中國共產黨決定性勝利將會很快來臨」，其次必須將中國革命作爲世界史革命的一部份來理解。「要瞭解支那史的話，支那史學者必須要成爲世界史學者。」更主張「支那史學者自身也必須革命」[58]。革命史觀在當時幾乎等同於「科學／體系」這個詞，如東洋史學研究者細井昌治在「中國革命史」[59]所指稱的「中國研究必須用真正科學的研究才行。」[60]以這種心情面對中國的變革，開始了革命史觀的進程。[61]此時的革

註 52　除了因爲左翼在戰時遭受壓迫的集體記憶外，更是意識到爲了反對「帝國主義日本對中國的扭曲」，而想傳達「真正中國的心情」。高橋孝助、古厩忠夫、安井三吉，「東洋史近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7 卷 5 号（1968 年 5 月），頁 757~758。

註 53　以之後的兩次反安保運動以及「福特基金會事件」爲例，主要學界的論述都是以和平與民主爲核心所建立的「論述規範」，這些規範不僅只有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是其中的重要言論武器。這種規範以反美爲核心，使得「反政府運動聯合不只是意識形態上面的聯繫，研究者們能藉此（各種規範）超越自己的領域而團結起來。」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眞男とその時代**（東京：世織書坊，1995），頁 11。

註 54　姫田光義，前引文，頁 21。

註 55　執筆人包括了仁井田陞（東大）、吉川倍次郎（京大）、平岡武夫（京大）、松本善海（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貝塚茂樹（京大）。山根幸夫，前引文，頁 493。

註 56　仁井田陞，「中国近代革命の歴史の課題」，**世界**（東京），44 期（1949 年 8 月），頁 16。

註 57　仁井田陞，前引文，頁 13。

註 58　貝塚茂樹，前引文，頁 39。

註 59　歴史学研究会編，**1949 年歴史学年報—歴史の成果と課題**（東京：岩波書店，1950）。

註 60　山根幸夫，前引文，頁 496。

命史觀擁有雙重含意，正是仁井田與貝塚／細井所指稱的「中國印象」與「中國研究方法」。

而作爲對革命中國的重視，**史学雑誌**在依朝代分期的東洋史回顧中，也增加了「現代中國」這一類目，首先就對「革命」的相關研究進行介紹，岩村三千夫、橘樸就開始討論階級關係、反革命社會基礎等等。1950 年代可說是革命史觀的黃金時期，連對「近代」（革命中國之前的中國）的看法也受到了影響，由 1951 年開始的「太平天國」相關研究可以看出，乍看之下跟現代中國無關，但主要在於革命分期的立場上，將太平天國作爲第一次「階級農民革命」⑫，當做民國革命或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先聲」⑬，代表性的有波多野善大⑭和增井經夫⑮的研究。革命史觀指出：將太平天國視爲推翻封建制近代革命的轉捩點，證明革命的條件自此開始，才能解釋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中國內戰是社會主義革命。1950 年代之前的革命史觀，注重於將中國歷史重編爲「革命階段史」，並將社會主義中國視爲最終革命的代表。同時以「唯物史觀」爲基準，尋找中共革命得以「成功」的條件，強調經濟方面之生產力因素，因此將太平天國視爲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契機，特別強調其作用。

在現狀分析上則是對中國五大運動的革命性爲主，其中所內藏的馬克思主義階段論前提，對於中日兩國的位置有著微妙的立場，依照革命史觀學者看來：國家發展上中國是居於日本的前方，而日本未來道路也必須以中國爲鑒。當時研究的特色是：對於中共所從事的政治動向高度關心，而且都賦予「革命進程」的意義。諸如：天野元之助〈中国に於ける土地改革の新方向－土地法大綱より土地改革法へ〉⑯，文學研究者波多野太郎的〈中国の現代文学と土地改革〉⑰等諸篇論文。到 1960 年**講座近代アジ**

註⑪　同時反對派的吉川指出：中國的現狀「極端不足」，所以中國「都市的生活」與「農村的生活」，差距會越來越大，所以中國革命會變成「大規模的農民暴動，百姓造反。」也就是以傳統中國歷史的眼光而言，中國歷史一向的路徑。山根幸夫，前引文，頁 494。而松本則是還持懷疑的態度：到中國革命爲止的中國研究者中的「支那通」、「支那問題研究者」要與「漢學通」、「支那學者」分開，前者對於討論時事問題，後者專職研究過去中國。這些「中國學」研究者的心中「對於過去中國的尊敬與對於現代中國的辱蔑同居著」，所以現在對於中國的是不是會變化，這兩個視角正不斷押扎著。……這就是所謂「中國研究者的苦悶」，是當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山根幸夫，前引文，頁 494。

註⑫　以仁井田爲代表，認爲「太平天國戰爭基本的性質是：基本上作爲打倒清廷以及地主的農民戰爭，而且是對於歐洲資本主義攻勢而第一次發起的農民抗爭，太平戰爭之後，陸陸續續發起了民族工業以及『國有企業工廠』，民間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也漸次興起。」仁井田陞，前引文，頁 13。

註⑬　市古宙三，「中国における太平天国史の研究」，**史学雑誌**（東京），60 卷 10 号（1951 年 10 月），頁 71~72。

註⑭　波多野善大，「太平天国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東京），150 期（1951 年 3 月），頁 32~42。

註⑮　増井経夫，**太平天国**（東京：岩波書店，1951）。

註⑯　天野元之助，「中国に於ける土地改革の新方向－土地法大綱より土地改革法へ」，**松山商大論集**（愛媛），2 卷 2 号（1951 年 6 月），頁 57~81。

註⑰　波多野太郎，「中国の現代文学と土地改革－白毛女から暴風驟雨」，**横浜大学論叢**（神奈川），3 卷 5 号（1952 年 1 月），頁 289~312。

ア思想史⑭中，以「社會主義爲正統」作爲核心觀念，將其他的思想體系做出整理，對於當時社會主義的風潮可見一斑。

伍、文革前革命史觀所遭受的衝擊與論爭

文革前主要的革命史觀論爭表現在研究方法的 4 次挑戰上。第一次是由 1956 年「蘇共二十」開始以來中蘇共的分裂。中國自居「正統社會主義」而稱蘇聯（共產國際、日共的主要理論來源）是「修正主義」，「社會主義路線」開始出現分岔口。最早在 1957 年日本的左翼學者就遭受意識形態無法自圓其說的衝擊，史學界開始反省馬克思主義的風潮是否正確？在坂本太郎的分析中，「馬克思主義雖然是戰後對皇國主義史觀的反撲，也注重個別現象背後的理論，但由於輕視實證史學，使史學界走向對立。」⑮以及「歷史学研究会」1957 年的創立 25 週年大會主題「戰後歷史学の方法的反省」可以看出，日本在 1957 年已經不完全依賴馬克思主義，同時也「開始」⑯尋找多種的討論歷史的方法，同樣的見解，在岩生成一的論文⑰中也能找到。

第二次是在史觀與發展路徑的問題上，革命史觀主要的對手是「西歐近代化」路線。1950-60 年代的十數年間，對於日本總體的發展經過了 3 種層次（近代化路徑、社會主義路徑、增長與發展路徑）的思考，但都不脫離認爲「亞洲」落後的視角。1950 年代受到美國「科學」的影響，學界思維「共同的基調是將東洋／中國的傳統持否定／悲觀的態度，回到了近代化的途徑。」⑱進行到 1960 年代，一轉成爲以增長和發展爲基礎的經濟理論⑲。這種視角衝擊了馬克思主義與德國歷史學派的「階段論」。⑳可以說整個 60 年代，近代化論正在蓬勃發展，成爲日本亞洲觀與自身定位的主流論述。宏觀而言，近代化以經濟發展爲主軸的基調也被社會主義者接受，但主要爭論的部分是「中國／日本」的發展位置關係。包括「日本と中国の近代化」㉑；**歷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歷史学の方法とアジア**㉒等等。

註⑭ 西順藏等編，**講座近代アジア思想史**（東京：弘文堂，1960-1）。

註⑮ 坂本太郎，「日本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東京），67 卷 5 号（1958 年 5 月），頁 374–375。

註⑯ 坂本太郎，前引文，頁 375。

註⑰ 岩生成一，「日本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東京），68 卷 5 号（1959 年 5 月），頁 474。

註⑱ 村松幼次，「戰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一橋論叢**（東京），23 卷 1 号（1950 年 1 月），頁 62。

註⑲ Walt Whitman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日文版：W.W.ロストウ著，木村健康、久保まち子、村上泰亮譯，**経済成長の諸段階：一つの非共産主義宣言**（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61）。

註⑳ 山室信一，「面向未來的回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部，2004），頁 24。

註㉑ E.O.ライシャウアー（Edwin O. Reischauer, 賴孝和），「日本と中国の近代化」，**中央公論**（東京），78 卷 3 号（1963 年 3 月），頁 60–70。

註㉒ 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歷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歷史学の方法とアジア**（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

第三次是關於內部邏輯問題，來自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大塚久雄指出「發展史觀」其實是融合了跨國與跨時空的概念，雖然能說歷史上確實具有「亞洲的貢納制→希臘羅馬的奴隸制→中歐的封建制→西歐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證歷程，但是對於單一地區從「貢納制→資本主義」的直線發展並不能說是理所當然的。⑰這樣從內部邏輯性對於社會主義線性史觀的質問，隱含對單一社會整體性理解的必要性，也是後來美式區域研究在日本實踐時的重要基礎理論之一。

第四次是 1961 年的史學界掀起了對歷史哲學與方法論的思辯。首先，在「總說回顧と展望」的總論中，林建太郎分別討論了波普（Karl Popper）的哲學的貧困中對於歷史主義的反全體主義歷史哲學思辯，從而說明「漸進式社會技術學」（piecemeal social technology，日文原文：漸次的社会工学）⑱的主張；其次討論卡爾（E. H. Carr）對於「具體的全體」和「時代的一般趨勢」的看法，雖說與波普所抨擊的馬恩哲學有某種程度的相合，但也特別強調要注意特殊性與一般性的問題。⑲學界由此開始，對於馬克思方法論產生新的視角，有上山春平「維新分析の三つの着眼点」中，將馬克思的五階段論歷史改爲生態學的「自然社會」、「農業社會」、「產業社會」⑳，所使用的方法還包括了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以及其他文獻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㉑的注意。自此日本學界開始從「革命」的巨大範疇中開脫，漸漸出現另一些聲音。

表 2　戰後 4 次對革命史觀的挑戰

年代	挑戰方向	論點	影響／修正
1957	方法論霸權	社會主義是否獨一無二	增加其他面向的思考
1950-60年代	近代化路徑	社會主義是否較資本主義優越	部分學者轉而以客觀發展代替主觀價值
1960	發展進程	「貢納制→資本主義」的質疑	必須注重個別區域
1961	歷史哲學	反全體主義與特殊性	注意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歷經數次的挑戰之後，日本學界的「方法論」已經逐漸走向多元，學界漸漸出現不同的聲音，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對研究者自身經驗的關注。至此革命史觀兩大支柱（視角／方法論）之一已經產生變化。1964 年是史學會創立 75 週年，山本達郎綜觀 75 年的史學研究歷史中，歸納發現日本史與東洋史學者缺少理論，而西洋史學者即使有理論，也是套用西方本來的理論。㉒若說 1964 年的現在日本學界依然缺少「體系化」的著作，要怎樣對此間的革命史觀加以理解？若認爲其不足以稱爲體系的話，則

註⑰　大塚久雄，**西洋経済史講座**（東京：岩波書店，1960），頁 1~3。
註⑱　林建太郎，「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1 卷 5 号（1962 年 5 月），頁 471~474。
註⑲　林建太郎，前引文，頁 474。
註⑳　上山春平，「維新分析の三つの着眼点」，**思想と科学**（東京），35 卷（1961 年 11 月），頁 28~34。
註㉑　安藤彦太郎，「陝甘寧辺区の公営経済」，**早稲田政治経済学雑誌**（東京），168 期（1961 年 4 月），頁 45~60。
註㉒　山本達郎，「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4 卷 5 号（1965 年 5 月），頁 497。

顯然這樣的評論有其「內面的意義」，正是學界已經漸漸想要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主軸思考，而想找其他的出路。學界開始對馬克思主義觀念的「一體適用」感到不足，表現在應用大量的戰前中國資料而非公式化的套用主義所做出的研究，如**現代中国入門**[83]、**中国革命史太平天国から人民公社へ**[84]、**中国の国民生活**[85]。上述著作中以大量的事實內容呈現，不同於純觀念論的方法，從研究者自身的經驗出發，[86]也就是提倡實證主義研究，在之後造成了社會主義理論內部「普遍性／特殊性」的衝突。

文革開始前的大作——福島正夫的**中国の人民民主政権その建設と過程と理論**一書[87]，提出「所謂革命問題即爲國家權力問題」的列寧式主張，套用到現代中國「人民民主政權」即爲「擁有人民民主主義權力的政治權力」。要言之，福島以統一戰線與民主集中爲核心，設定「中國／俄國革命」與「國／共黨」兩組視角，同時討論繼承問題與權力鬥爭問題，將 24 年以降的「政權」與「國家論」的分析與分期加以闡明。分爲「勞農民主獨裁の政權建設と國家機構」(兩次革命戰爭時期，重視民主)；「人民民主政權の部分建設と國家理論」(抗日戰爭時期，重視統一戰線與民族主義)；「人民民主政權の擴大發展と國家理論」(國共內戰時期，將新解放區的政權力量由上而下實踐)；「全國成立と發展」(49 年後，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建設)。被認爲在方法上、研究視角上對革命史觀的重要分期著作。[88]由於本書大體上雖以「革命」爲核心，但是中間的統一戰線問題、民族主義問題都被放到與社會主義進程同樣的價值來思考，也就是說，研究者發現：「中國」不再完全表現爲階級史觀的舞臺，而是擁有自主思維的特殊族群，同時中「國」也具有自身「國家利益」。

陸、文革與革命史觀

一、從革命史觀到批判運動

1996 年開始的中國文革，促使日本學者將理論與社會運動結合後產生批判浪潮，「馬克斯主義當時作爲最強力的指導原則，不斷結合民眾運動的同時，日本社會主義的內涵也在不停的修正。」[89]在文革前半的 70 年代，社會史觀與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在 1969 年的「現代世界中的研究者」座談會中提出了中國研究者與學生、學問、

註[83] 新島淳良、野村浩一編，**現代中国入門：何を読むべきか**（東京：勁草書房，1965）。

註[84] 池田誠、儀我壯一郎、松野昭二共著，**中国革命史太平天国から人民公社へ**（京都：法律文化社，1965）。

註[85] 山下竜三、儀我壯一郎、梅川勉共著，**中国の国民生活**（京都：法律文化社，1965）。

註[86] 佐伯有一、安井山吉、古厩忠夫，「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5 卷 5 号（1966 年 5 月），頁 729。

註[87] 福島正夫，**中国の人民民主政権その建設と過程と理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5）。

註[88] 佐伯有一、安井山吉、古厩忠夫，前引文，頁 733。

註[89] 大九義一，前引文，頁 108。

大學、課題 4 個面向的關係。[89]學生的自主團體在羽田鬥爭、日大鬥爭、東大鬥爭時以中國問題爲槓桿來質問「日本社會」，比如說林彪的「人民戰爭論能否適用在日本？」等等討論，這些都是研究者認爲自身有義務要回答的。[90]與其說是對社會的關懷，不如說是研究者被迫要將問題意識放在現在，不能只追求學術系統中的合理完整性，而要更多回答與現在日本的關係。同時受到文革的帝國主義批判影響，當時的中國研究者對於自我定位與美日關係的反省，召開了「中国研究者の造反と自我批判」座談會[91]，目的在於「藉由探討日本中國研究的目的，來考慮現在日本中國研究的現狀。」[92]這些批判會中，都把「動機」提到最高的位置，可以說漸漸脫離原有的學術脈絡。文革的 10 年動亂，使得原始資料取得更進一步困難，更沒有空間檢討批判，甚至無法檢驗真僞，因此當時的中國研究演變爲充滿了感情與立場的色彩。學者們對此並無共識，既缺乏相互的討論，也因爲學問的見解、政治的立場不一樣，造成了感情的對立，終於在文革時「龜裂」(原文用語)，對社會造成傷害。[93]這樣一來革命史觀的關注重心只留下了「視角」而非「研究方法」。[94]

以 1969 年田中正俊引用竹內好的發言，歸納出當時中國研究的背景：一、受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國交未恢復、日中共分裂、美國的越南戰爭中對後進國的輕視影響，日本人對中國觀感不佳。二、日本人的中國觀是片段的，而且有意識形態過重之嫌。三、與其說是對中國的「知識」問題，不如說是對中國的基本態度問題。因此呼籲，對文化大革命不能採用「卑俗的權力鬥爭史觀，而必須對中國大眾有信賴與希望。」[95]這一階段的「革命史觀」，與其說是作爲學術的馬克思主義，不如說是文革的毛思想作爲基礎，將動機等意識問題提到道德範圍討論。

以**講座日本史**套書[96]爲例，不斷強調從「課題設定開始，就必須注意到學問的社會的意義。」[97]其中含括了戰後到當時歷史學作爲學科的倫理學基礎的 5 個面向：包括 1. 以民主主義檢討帝國時期中歷史學爲政治服務的性質並提倡民眾史、抵抗史的研究視角[98]；2.社會科學概念與歷史學的關係[99]；3.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理論路線的演進分

註[89]　石田米子、西順藏、野原四郎，「現代世界における研究者」，菅沼正久等編，**講座現代中国**（東京：大修館書店，1969），頁 1~30。

註[90]　石田米子、西順藏、野原四郎，前引書，頁 2。

註[91]　Mark Seldan, 幼方直吉、戴國煇、小島麗逸、加藤祐三、波多也宏一，「中国研究者の造反と自我批判」，**朝日ジャーナル**（東京），1970 年 3 月 8 日号，頁 17~25。

註[92]　Mark Seldan，前引文，頁 17。

註[93]　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頁 5。

註[94]　田中正俊，「総說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7 卷 5 号（1968 年 5 月），頁 525。

註[95]　共有 10 卷。歷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史** 1-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0-1）。

註[96]　荒井信一，「序」，**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1。

註[97]　以上請參考中村正則，「現代民主主義と歷史学」，**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3~54。

註[98]　包括量化／理論化、歷史學與其他學科連結、實證研究作爲方法論的意義。金原左門，「社会科学の諸理論と歷史學」，**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55~96。

析[10]；對於動機問題包括兩類：4.歷史教學制度[11]與 5.國民意識的反省[12]。以上 5 點，都是將學術放在帶領社會思潮的角色。另一方面，支持革命史觀的野村則是將批林批孔運動上升到「一舉突破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的三重歷史根源，也就是文革的頂點，全新的解放」[13]。但是以毛思想當作革命史觀基礎的研究者，過於強調脫離實際與觀念論，與整個學術脈絡方向衝突，反而使得革命史觀失去面向群眾的立場，與大部分的研究者走向不同的道路。

二、革命史觀退潮

學界對於文革觀點的重要轉變，來自中西功對中共的批評，同時也是史學界一般公認爭議最高的作品[14]，其中對於文革的非難眾多，認爲中共的處理方法是不顧黨章與法律，採用流血的全國性武鬥，而紅衛兵也呈現狂亂的態勢。這樣一來揭露了中共的現實課題與矛盾，令學界受到衝擊。[15]因此在 1971 年開始，日本歷史學界的最大組合歷史学研究会，試圖將「文革」放入相對的客觀立場，開始著手**アジア現代史**的編輯。[16]在文革高潮過後的 1971 年，以江口朴郎、中西功的對談[17]爲代表，整理了革命史觀的重要論點及視角。包括：中國革命對世界史的意義、中國與俄國革命的比較與繼承、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中國的自我認識與其過程以及世界的基本矛盾等重要問題意識。這些「整理」的工作，象徵學界對文革的氣氛轉變。

自此開始文革也造就了對中國形象的研究反省，野村浩一以中蘇共的比較發展，說明中共與蘇共的「先鋒黨」概念不同，中共是「核心黨」。也就是說中共本身不是跟著馬列主義價值行動，而是藉由自身的變化來對應種種的政治變化，諸如文革時對於「黨即國家、行政肥大化、中央權力的集中」做出調整。[18]柴田穗以「毛澤東的現實主義」爲基礎分析的**周恩来の時代**[19]以及藤村俊郎整理出當時關於新中國的國家性格等主要日本研究成果，對於當時中國研究界的權力論有集大成的整理。[20]以上文獻已經

註[10]　犬丸義一，前引文，頁 97~172。

註[11]　山田昭次，「歴史学と歴史教育」，**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173~200。

註[12]　佐藤伸雄、梅田欽治，「国民歴史意識と歴史学」，**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201~250。

註[13]　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頁 8。

註[14]　請參考：中西功，**中国革命と毛沢東思想：中国革命史の再検討**（東京：青木書店，1969）。若是對照中西功作爲日本社會主義中國研究者的代表人物，就更能看出這段時期的轉折。

註[15]　久保田文次，「東洋史近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9 卷 5 号（1970 年 5 月），頁 905。

註[16]　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頁 5。

註[17]　江口朴郎、中西功，「中華人民共和国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歴史評論**（東京），256 期（1971 年 11 月），頁 1~21。

註[18]　請參考野村浩一，**中国革命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71）。野村浩一，「中国革命と革命中国－中国を訪れて」，**世界**（東京），310 期（1971 年 9 月），頁 38~49。

註[19]　柴田穗，**周恩来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71）。

註[20]　藤村俊郎，「中国における新民主主義革命の発展とプロレタリア階級独裁の成立について－わが国における代表的見解の検討」，**商学論集**（福島），41 卷 6 号（1973 年 10 月），頁 188~259。

不認爲革命有其神聖性，中共也不完全按照社會主義發展進程前進，現實主義與理性才是中共主要的行爲模式。上原一慶則是將大躍進視爲中國脫離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而謀求自己的建設方式」是與以往的中國觀大異其趣的。[卌]

自此中國研究界已然將「中國從蘇聯中分立出來」，在意識形態、黨政模式、社會發展、外交、經濟方面，日本學者自此認識到了中國與蘇聯的不同。在方法論上一方面是代表馬克思主義科學化、普遍化的路徑遭受質疑，二方面是區域研究與中國特殊論成爲當然的前提。面對此一現象的關鍵詞是「過渡期」，定義一般是說：「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中間階段。」這個詞被用來廣泛的形容現階段的中國各種層次上的發展，是因爲這超出了原來各種理論模型，成爲理論上的空白，而又必須以原來的架構加以理解。在之後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這個概念不斷延伸到別的地方，如大躍進時期、甚至是太平天國時期。也就是對於原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空隙進一步反省，中國研究試圖脫離革命史觀框架的努力。從 1972 年以降的著作中，雖然文革還在進行，但是日本研究者對於「革命」信心逐漸消退。「從蘇聯中分立出來」所代表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再是全體一致的存在」，無寧更能說是認爲「中國有其自身的國家利益」。這樣一來，不僅是把「革命」放入客觀視角，甚至逐漸走向否定革命的傾向。革命史觀自此走向沈默。

柒、結　論

相較於美國中國研究在戰後著重的「意識形態研究」，是指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進行研究，而不是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爲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日本社會主義者自戰前開始就思考著將中國整體發展納入社會主義的範疇之中，自始就帶有對日本自身處境的關心。加上戰後對「戰前帝國主義」扭曲史觀的反省，所以日本社會主義者自此更加努力傳達「真正的中國」，認爲「真正的中國發展正是環繞革命與建設的鬥爭發展的革命史觀」。因此在文革之前，革命史觀一直是中國學研究的核心。文革時研究者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傾向到達頂點，但文革之後轉而能夠冷靜看待[卌一]，日本學界漸漸將中國視爲一個「追求利益的普通民族國家」。

本文以「革命史觀」思想系譜爲核心，約 50 年間中國研究／社會主義思想的轉變，首先對戰前社會主義系譜做出回顧，其次在歷年重要著作中發掘其中的路線與脈絡，以及日本研究者在應用馬克思主義時的詮釋。革命史觀來自於特殊的歷史條件，戰前的馬克思主義並不與中國劃上等號，而是在日本國內對於言論思想自由壓抑政策後，左翼只好前往滿州與中國境內，當時滿州鐵道部甚至有「左翼的花園」之稱。以此爲契機伴隨著中國實地研究經驗結合社會主義的研究者，在戰後成爲中國研究的主力。戰後天皇制與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受到否定，日本思想界也開始思考「日本革命」的可能性。而「新中國」建立之後，更是將中國視爲後進性革命成功的代表，甚至超

註卌　姫田光義，「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83 卷 5 号（1974 年 5 月），頁 678。

註卌一　伊藤一彦，前引文，頁 3-4。

越歐洲。戰後日本中國研究始於對「亞細亞停滯論」反駁的革命史觀，研究者以帶有嚮往社會主義中國的心情，對之前的明、清與民國中國全都否定；並主張「斷絕」，將社會主義中國視爲與前代完全隔絕，同時道德上也絕對正確。

革命史觀分爲兩種層次，分別是「方法論／中國視角」問題。作爲方法的馬克思主義在 1956 年開始「中蘇交惡事件」而遭受衝擊，之後「近代化路線」、「大塚史學」、「波普歷史哲學」都扮演了在方法論上的挑戰角色，作爲方法的馬克思主義也逐漸修正，最大的成果就是擺脫觀念論，以及結合大量日本所擁有的中國原始資料，從而注意到「馬克思主義地方化／特殊性」的問題。作爲視角的革命史觀，則在文革時以「自我批判」的形式達到最高點，隨著文革對毛崇拜上升的過程中，逐漸失去實證與理性基礎，使得學界對立與分裂。令人意外的是，早在文革高潮過後（林彪事件）的 1971 年，就產生了反省，提出「中國有其自身的國家利益」的觀點，革命史觀自此失去神聖性，革命運動只不過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而已。

革命史觀沈默之後，史學研究者致力於應用民國甚至於將「宋—清」連接到現代中國連續歷史的視點，思想史之外、地區性、宗教、禮俗等研究領域也因此開展。近期更致力於將 1949 革命的位置相對化，對於中國近現代史有統一的觀點。也就是把 1949 年看成經過點，而非出發點或到達點。同時注重連續與不連續的部分，對於 1949 的革命賦予歷史位置，並對於個別歷史研究加以推進。[10] 雖然現在幾乎沒有以此立場研究的氣氛，甚至既有的革命史觀著作也漸漸成爲被批判／推翻的文獻，但即使如此，革命史觀象徵了一個世代的集體思維，放在當時的脈絡中，仍可看出當時整個活躍的日本學界不斷思考，爲了當時的日本，甚至是中國與世界找到「未來」的努力。

*　　*　　*

（收件：96 年 6 月 11 日，修正：96 年 8 月 17 日，接受：96 年 8 月 20 日）

註 10　久保亨、江田憲治，前引文，頁 265。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Revolution and Genealogy of China Studies in Postwar Japan

Hsuan-lei Shao

Ph.D.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Revolution" is one of the core ideas of China studies in postwar Japan. Especially in 1949-1972, it was the most popular methodolog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further enhanced the understanding of perspectives of today's China and Japan. Their research then evolved into two issues: "methodology" and "viewpoint on China". However,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Revolution declined from 1972, and the viewpoint of "seeing China as a nation-state with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 emerge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eek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Revolution" and "Genealogy of Socialism in Japanese China-Studies" and finds their historical and social meanings.

Keywords: genealogy; methodology; modern China studi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revolotion; postwar Japan; socialism

參考文獻

山室信一，「面向未來的回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部，2004），頁 24。

石之瑜，「退出中國—近代日本對華思想中的普遍性方法與政治正確性問題」，**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1~8。

石之瑜、李靜旻，「斷代與斷裂－日本近代中國認識的基礎脈絡」，**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9~27。

卡爾・A・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譯，**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1989）。

李紅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來龍去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3 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1~23。

李朝津，「日本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慶應義塾大學政治學科之個案研究」，**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29~45。

李曉東，「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85~97。

周兆良，「日本高等教育對中國的教學議程初探」，**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99~114。

林泉忠，「祖國的弔詭－現代衝擊下沖繩身份的脫中入日現象」，**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47~67。

孫歌，「在大陸語境中翻譯竹內好－進出政治正確的中國論述」，**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69~84。

喬志航，「當代中國學研究格局」，**廣東社會科學**（廣東），2000 年 1 期（2000 年 1 月），頁 138。

嚴紹璗，「戰後 60 年日本人的中國觀」，**日本研究**（北京），2005 年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1~6。

Rostow, Walt Whitman,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60）。

ライシャウアー，E.O.,（Edwin O. Reischauer，賴孝和），「日本と中国の近代化」，**中央公論**（東京），78 卷 3 期（1963 年 3 月），頁 60~70。

Seldan, Mark, 幼方直吉、戴國輝、小島麗逸、加藤祐三、波多也宏一，「座談會：中国研究者の造反と自我批判」，**朝日ジャーナル**（東京），1970 年 3 月 8 日号，頁 17~25。

ロストウ，W.W.著，木村健康、久保まち子、村上泰亮翻譯，**経済成長の諸段階：一つの非共産主義宣言**（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61）。

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解體過程にある支那の経済と社會**（東京：中央公論，1934）。

上山春平，「維新分析の三つの着眼点」，**思想と科学**（東京），35 卷（1961 年 11 月）。

上原淳道、山根幸夫，「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59 卷 5 号（1950 年 9 月），

頁 44~45。
久保田文次，「東洋史近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9 巻 5 号（1970 年 5 月），頁 905。
久保亨、江田憲治，「現代」，礪波護等編，**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 年），頁 264~289。
大宅壯一編，**社会問題講座**（東京：新潮社，1926-7）。
大塚久雄，**西洋経済史講座**（東京：岩波書店，1960）。
小谷汪之，「（半）植民地・半封建社会構成の概念規定：中西功・大上末広の所説の検討」，**歴史学研究**，466 期（1977 年 7 月），頁 68~76。
山下竜三、儀我壯一郎、梅川勉共著，**中国の国民生活**（京都：法律文化社，1965）。
山本達郎，「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4 巻 5 号（1965 年 5 月），頁 497~501。
山田昭次「歴史学と歴史教育」，**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173~200。
山根幸夫，「現代：戦後の日中交流とわが国中国現代史研究の背景」，山根幸夫編，**中国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 年），頁 488~539。
中西功，**中国革命と毛沢東思想：中国革命史の再検討**（東京：青木書店，1969）。
中村正則，「現代民主主義と歴史学」，**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3~54。
仁井田陞，「中国近代革命の歴史的課題」，**世界**（東京），44 期（1949 年 8 月），頁 12~21。
天野元之助，「中国に於ける土地改革の新方向－土地法大綱より土地改革法へ」，**松山商大論集**（愛媛），2 巻 2 号（1951 年 6 月），頁 57~81。
犬丸義一，「戦後日本マルクス主義史学に関する覚書」，歴史学／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97~172。
市古宙三，「中国における太平天国史の研究」，**史学雑誌**（東京），60 巻 10 号（1951 年 10 月），頁 71~80。
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歴史学の方法とアジア**（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
田中正俊，「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7 巻 5 号（1968 年 5 月），頁 525。
矢野仁一，**満洲国歴史**（東京：目黒書店，1932）。
石田米子、西順藏、野原四郎，「現代世界における研究者」，菅沼正久等編，**講座現代中国**（東京：大修館書店，1969），頁 1~30。
伊藤一彦，「日本的中国研究」，**現代中国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1990 年），頁 3~53。
安藤彦太郎，「陝甘寧辺区の公営経済」，**早稲田政治経済学雑誌**（東京），168 期（1961 年 4 月），頁 45~60。
江口朴郎、中西功，「中華人民共和国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歴史評論**（東京），256 期

（1971 年 11 月），頁 1~21。
池田誠、儀我壯一郎、松野昭二，**中国革命史太平天国から人民公社へ**（京都：法律文化社，1965）。
羽仁五郎等，**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講座（系列）**（東京：岩波書店，1932）。
西順藏等編，**講座近代アジア思想史**（東京：弘文堂，1960-1）。
佐伯有一、安井山吉、古厩忠夫，「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5 卷 5 号（1966 年 5 月），頁 729~38。
佐藤伸雄、梅田欽治，「国民歴史意識と歴史学」，**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201~250。
村松幼次，「戦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一橋論叢**（東京），23 卷 1 號（1950 年 1 月），頁 62。
阪口勉，「日本古代社会論」，歴史学／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史 9**（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 年），頁 41~75。
坂本太郎，「日本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67 卷 5 号（1958 年 5 月），頁 374~378。
国分良成，「建国 50 年－中国研究と中国近現代史の再検討」，**北大法学論集**（札幌），51 卷 4 号（2000 年 11 月），頁 1390~1419。
岩生成一，「日本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68 卷 5 号（1959 年 5 月），頁 474~477。
林建太郎，「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1 卷 5 号（1962 年 5 月），頁 471~477。
松本善海，「中国の苦悶と中国研究者の苦悶」，**世界**（東京），44 期（1949 年 8 月），頁 31~38。
波多野太郎，「中国の現代文学と土地改革－白毛女から暴風驟雨」，**横浜大学論叢**（神奈川），3 卷 5 号（1952 年 1 月），頁 289~312。
波多野善大，「太平天国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東京），150 期（1951 年 3 月），頁 32~42。
金原左門，「社会科学の諸理論と歴史学」，**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55~96。
政治批判社編，**マルクス主義講座**（東京：マルクス主義講座刊行会，1927-1928）。
姫田光義，「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83 卷 5 号（1974 年 5 月），頁 678。
姫田光義，「中国革命と中国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大阪），第 7 期（2000 年 9 月），頁 16~27。
柴田穂，**周恩来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71）。
荒井信一，「序」，**講座日本史 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 1。
高橋孝助、古厩忠夫、安井三吉，「東洋史近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77 卷 5 号（1968 年 5 月），頁 757~758。
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真男とその時代**（東京：世織書坊，1995）。

野村浩一，「中国革命と革命中国－中国を訪れて」，**世界**（東京），310 期（1971 年 9 月），頁 38~49。
野村浩一，**中国革命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71）。
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アジア現代史**（東京：歴史学研究会，1985 年 11 月），頁 4~36。
野沢豊，「回顧と展望」，**現代中国研究**（大阪），第 3 期（1998 年 9 月），頁 101~118。
新島淳良、野村浩一編，**現代中国入門何を読むべきか**（東京：勁草書房，1965）。
福島正夫，**中国の人民民主政権その建設と過程と理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5）。
遠山茂樹，「世界史把握の観點」，**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之水書房，1996 年），頁 3~20。
増井経夫，**太平天国**（東京：岩波書店，1951）。
歴史学學研究会編，**1949 年歴史学年報－歴史の成果と課題**（東京：岩波書店，1950）。
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0-1）。
藤村俊郎，「中国における新民主主義革命の発展とプロレタリア階級独裁の成立について－わが国における代表的見解の検討」，**商学論集**（福島），41 卷 6 期（1973 年 10 月），頁 188~259。